

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 美国媒体兼并浪潮及其启示

田中阳*

经济学家视野中的世界传媒市场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在西方传媒市场，以美国为代表，发轫于上世纪90年代中期的媒体兼并浪潮正风起云涌；而在中国传媒市场，自1996年开始的传媒集团化改革亦如火如荼。西方市场频繁的媒体兼并、中国市场积极的改革尝试正在奠定世界传媒市场的新格局。

毋庸置疑，影响世界传媒市场秩序的这两种力量是截然不同的。中、美媒体市场的发育程度迥异，所有制结构截然不同，美国传媒市场的经营模式并非中国传媒经营体制改革照搬摹写的蓝本，中国日益深化的改革应努力谋求合乎国情的传媒经营模式。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研究美国媒体兼并浪潮的规律，对进一步推进中国传媒集团化改革富有积极意义。

* 田中阳（1954—），湖南湘乡人，湖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出版专著4部，主编湖南省普通高等教育“九五”重点教材一部，湖南省高等教育21世纪课程教材一部，发表学术论文八十余篇，其中有十余篇由“人大复印资料”全文复印，有十余篇由《中国社会科学文摘》、《新华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北京大学学报文摘》、《光明日报文摘》摘编观点；主持国家课题、省社科课题、省教育厅重点课题多项；其著作两次获湖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两次获湖南图书奖二等奖，曾获湖南师范大学学术著作特等奖、学术论著特等奖，等等。

一、新自由主义背景下的美国媒体兼并浪潮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掀起了新一轮企业兼并浪潮。据统计，1994 年美国企业并购交易额达 3419 亿美元，1995 年达 5190 亿美元，1996 年达 6588 亿美元，^[1] 1997 年高达 9570 亿美元。^[2] 这次兼并浪潮规模空前，其交易额大大超过历次兼并浪潮。如在前一轮兼并浪潮中，高峰期 1984、1985 年的交易额仅达 1222 亿美元和 1796 亿美元。^[3] 与以往历次兼并浪潮相比，此次兼并浪潮的一个典型特征是，兼并之风虽波及各个行业，但兼并浪潮主要集中在金融、通信、传媒业等第三产业。其中，媒体兼并在本次兼并浪潮中独具特色，其频率之繁，规模之大，历时之久，都十分引人注目。据统计，1995 年、1996 年和 1997 年，美国传媒市场发生的兼并收购案分别高达 194 宗、210 宗和 187 宗（如图 1 所示）。一些兼并案动辄数十亿美元，多则数百亿美元。单宗兼并案所涉及的金额是以往兼并浪潮中数十宗兼并案所涉及金额的总和。例如，1999 年，维亚康姆（Viacom）收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交易额达 460 亿美元；2000 年，美国在线（AOL）以 1640 亿美元的天价收购时代华纳（Time Warner）（收购后的整合不成功），是迄今为止全球最大的媒体兼并案。^[4] 至今，美国此番媒体兼并浪潮仍余波未止，惹人注目的大型兼并案例时有发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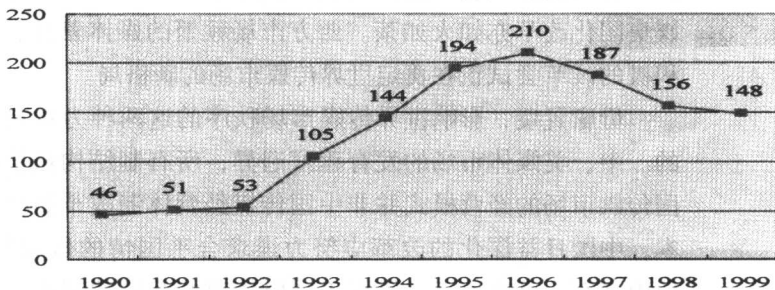


图 1

此前，美国历经了四次企业兼并浪潮，第一次发生在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第二次发生在 20 世纪 20 年代，第三次发生在 20 世纪 50~60 年代，第四次发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每次兼并浪潮都有深刻的社会经济背景。特定的社会经济背景既揭示了历次兼并浪潮产生的原因，又铸就了每次兼并浪潮的内在规律，因而，兼并浪潮所处的社会经济背景是理解其成因、特征及趋势的基本依据。

美国这次兼并浪潮发生在英、美等工业国家“重新发现市场”的时代。20 世纪

70年代末、80年代初,面对席卷西方世界10年之久的“滞胀”,强调国家干预的凯恩斯主义束手无策、无力回天,英、美相继推行“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分别以货币主义、供给学派的政策主张为施政纲领,推行一整套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其他国家如加拿大、德国及北欧国家也纷纷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对原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进行大幅度调整和转向。自此,哈耶克、弗里德曼等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完全取代凯恩斯主义,在西方经济学说中占据主流地位,盛极一时的“凯恩斯时代”宣告终结,西方世界掀起了经久不衰的“新自由主义”浪潮。

新自由主义秉承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和萨伊的“萨伊定律”,推崇市场万能,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生活的过多干预,加强市场机制作用,刺激私人企业制度繁荣。因此,奉行新自由主义的西方各国都采取了一“紧”一“松”的经济政策,一方面收缩政府的经济职能,另一方面,放松对企业的管制。如里根政府在减免税收、削减公共支出、实行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同时,成立了以布什为首的撤销规章制度管制工作特别小组,重新审核了91种管理企业的规章,撤销和放松了65项规章和一系列其他影响企业效率的过严的管制法规。^[5]在里根的第一个任期内,各机构公布的联邦规章制度就减少了33%以上。^[6]里根以后的历任政府都强调要消除不合理的规章制度。1997年5月,美国财政秘书提交国会的金融改革方案,原则是取消银行与其他金融机构之间的法律界限,结束了金融系统64年分门别类的历史。^[7]此外,新自由主义也是美国制定反垄断政策的主流理论。新自由主义认为,企业在自由市场中经由长期竞争而形成的规模是最优规模,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之下,自由市场的边界已由美国国内市场扩展到了世界市场,政府应调整反垄断政策,减少对企业的干预。以此理论为指导,美国的反托拉斯法有所松动,执行力度明显下降。

美国政府对企业管理的放松,为企业营造了自由竞争的宽松环境。这种环境使美国企业又有可能在国内外市场扩大企业规模,结果,在美国这次企业兼并浪潮中,横向兼并是主要兼并方式(由于规章制度的撤销、反托拉斯法执行力度的下降),跨国兼并蔚然成风(源于西方世界的“新自由主义”浪潮,市场边界的扩大),金融、通信成为兼并的主战场。

在传媒市场,自由主义的沉浮完全决定了美国传媒政策的交相更替。1791年报业自由主义思想进入宪法的《权利法案》的第一条修正案,^[8]这是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传媒政策中的最初体现。在凯恩斯革命期间,美国政府通过《1934年通信